

重估梁啟超小說觀及其在 小說史上的意義

陳 俊 啟*

摘 要

梁啟超 (1873-1929) 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其小說觀可以說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小說的道德實用功利觀，但是基於時代的需求，梁氏賦與小說更神聖的使命——小說不僅要移風易俗，更要經國濟世、救國救民。在小說的發展上，梁氏的「小說界革命」及相關的言論將中國小說發展的方向做了一大移轉，不僅將政治言談帶入到小說中，擴大了小說的範疇，同時也對小說的本質、功用、及相關技巧做了相當的論述。本文以任公思想發展為經，以其小說論述為緯，試圖更深入勾勒出梁氏對於小說的看法及其產生的脈絡，探究其小說觀如何和外緣各種論述 (discourses) 相互作用，進而塑造成晚清特有的文化氛圍，不僅主導了晚清小說的發展，並為日後「感時憂國」的中國小說主流開啟先聲。

關鍵詞：梁啟超、小說、新小說、晚清文學、二德四力

一、前 言

中國在晚清時期進入李鴻章所謂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無論是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以至於歷千年屹立不搖的傳統世界觀及價值觀，皆

* 作者係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受到空前未有的衝擊。¹面臨此一社會、政治以及思想意識上的危機，晚清文學的發展亦相對地有所回應，呈現出蓬勃的氣象，而其中又以小說為翹首，不論是在小說創作和小說批評的質量和幅面之廣闊，小說地位的提升，以及小說和時代脈動息息相關之程度，都能超越前人而開啟新局，為中國現代小說奠下基礎。

要探究晚清小說如何發展，如何由傳統的「誨盜誨淫」一舉提升為「救亡圖存」的文類，梁啟超（1873-1929）顯然是一位樞紐性的重要人物。梁氏不僅在思想上為晚清時期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亦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力量。梁啟超的提倡「新小說」，在當時可以說是登高一呼四方響應，一時間小說的創作及評論文章充斥報刊雜誌。職業作家諸如李伯元、吳沃堯等人，試圖在小說作品中探討揭露時代及社會的弊病，同時也嘗試各種不同的小說體裁。晚清人士對於小說的討論也新舊紛陳，或是探討小說的實用功能及價值，或是鑽研小說的美學及藝術層面，更普遍的是借小說以傳播新知，鼓吹革命維新，真是百家爭鳴，各擅勝場，蔚為奇觀，為中國小說史上首見之現象。我們不能說此一現象是梁氏一手獨立造成，但是其開創之功，其影響之深且廣，則是不爭之事實。

中國小說發展到晚清，因為時代的變遷，已到了不得不變，而且不得不接受外來思潮的時候。由於梁氏感受敏銳，吸收新知能力特強，因此在提倡小說時往往採擷扶桑泰西之說，以為議論之根本；加上梁氏浸淫於中國傳統極為深厚，所以在其論小說的文字中，可謂中西雜陳、古今交映，正是晚清過渡轉變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字。既傳統又現代，既中又西，時而可見對小說又喜又懼的傳統看法，時而又見標榜宣揚之言論。大體而言，梁啟超的小說觀可以說是繼承了中國傳統小說的道德實用觀，但是基於時代的需求，梁氏賦與小說更神聖的使命。小說不僅要移風易俗，更要經國濟世、救國救民。為履行此一目標，梁氏明白表示識者應該利用小說特有的普遍適眾性及其吸引讀者的魔力，來傳播諸如「新民」、「自由精神」、「冒險犯難精神」、「愛國心」、「關切於今日中國時局者」、「吐露其所懷抱之政治思想」等社會政治思想。此舉顯然為中國傳統小說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將政治思想融入中

1 參看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卷（1978），頁475-484。

國傳統小說的內容範疇中，同時也為夏志清教授所謂的五四作家的「感時憂國」傳統開啟了先聲。²此一傳統可以說是任公一手奠下基石，經過五四、三十年代作家，一直到毛澤東的「延安講話」，甚至到了臺灣五十、六十年代的反共懷鄉文學，持續不衰，稱之為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流應可當之無愧。

任公這種政治傾向的小說觀，自然有其政治、社會的背景所在，大致而言，大部分討論任公小說觀的學者專家們也都是由此入手。這一面向的討論對於了解梁啟超的小說觀當然是極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不過相對而言，他們對於任公小說觀中的幾個觀念的本體性意涵的討論就略嫌簡單。比方說夏志清先生認為，「他（任公）用了四個比喻來說明小說的力量：一為『熏』，小說在讀者四週散佈煙霧，使他的五官和判斷能力都受影響。二為『浸』，讀者浸在故事的情景和問題中，讀後數日或數週尚不能免於憂愁、憤怒或別的情感。三為『刺』，讀者被故事中大力描寫的情景刺激得異常興奮。四為『提』，小說能把讀者提升至書中主人翁的層次，或促使其模倣之。」³夏曉虹在其研究梁啟超的專著《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中對於梁啟超的此「四力」也只是提出：

他專門分析了小說的四種感染力。一曰「熏」，即是熏陶，「如入雲煙中而為其所烘，如近墨朱者而為其所染」，從而產生潛移默化、連鎖反應式的普遍影響。二曰「浸」，即是「入而與之俱化」，長久沈浸在作品所帶來的情感氛圍中不能自拔，達到與作品情境的交融。三曰「刺」，即「刺激之義也」，「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受到突然的震動。四曰「提」，即是情感的昇華，「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讀者達到一種忘我的境界，「自化其身焉，入於書中，而為其書之主人翁」，引出模倣書中人物行動的強烈慾望。⁴

兩位夏先生都提到任公小說觀中的重要理念，但卻未能進一步深入討論這幾個概念及其意涵。⁵到了2001年，日本學者齋藤希史在《近代文學觀念

2 C. T. Hsia, "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ppendix to his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2n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533-554.

3 夏志清，〈新小說的提倡者：嚴復與梁啟超〉，收於林明德編，《晚清小說研究》（臺北：聯經，1986），頁69-70。

4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20。

5 在林明德，〈梁啟超與晚清文學運動〉（臺北：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89），頁174-178；邱茂生，〈晚清小說理論發展試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7）等論文中的討論亦如是。

形成期的梁啟超，山田敬三在 圍繞《新中國未來記》所見梁啟超革命與變革的思想 兩篇論文中也討論了梁啟超的小說觀，不過齋藤氏文章的重點在於梁啟超小說觀在近代文學觀念形成期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偏重的是中日文學觀念交流史上的重要議題。山田氏則以日本當代政治小說中所呈現的革命與變革思想，來對照勾勒任公在《新中國未來記》中的思想。兩位學者的論文各有其中心議題，但對於如「二德四力」的觀念，不是視作不證自明的觀念，就是語焉不詳。⁶

大致而言，處理的略為詳細的只有康來新《晚清小說理論研究》及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演變》中的討論。康氏以「小說移情作用的心理學分析」來含括梁氏的小說觀念，並加以分梳解釋。⁷黃氏大致也討論了「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的這幾個力量，並將任公的「二德四力」歸納為：「均屬於閱讀心理學分析」。⁸兩位學者均提出極為敏銳的觀察，但是對於「四力」，兩位先生的分析似乎也未能超脫其他學者的說法。

因此在本文中，我將藉由梁氏幾篇討論小說的重要文章，從比較研究的觀點，勾勒出其對小說的看法：任公所謂「新小說」為何？「新」在那裏？「小說界革命」又是什麼？任公所謂的「熏」、「浸」、「刺」、「提」四大功用，到底何所指？對於我們理解晚清小說有何裨益？所謂的小說與群治的關係又是如何？更進者，本文還要考察任公如何把小說由傳統消遣娛樂，兼帶有道德實用意涵的文類，一舉提升到救國救民，足可與六經並列、藏諸名山之盛業？最後，本文將任公小說觀之重要性及其影響作一總結性的評估。

二、梁啟超的小說觀

梁啟超的幾個口號，諸如「小說界革命」、「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二德四力」、「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但是任公討論小說的文字，其實篇幅並不多，如果按照年代排列的話，它們包括了：

6 兩位日本學者的論文見狹間直樹編，《梁啟超 明治日本 西方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289-320，頁321-346。

7 康來新，《晚清小說理論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頁189-195。

8 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演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頁97-101。

1. 《變法通議》論幼學 中論「說部書」的一段文字（1896）；
2. 蒙學報、演義報合敘（1897）；
3. 譯印政治小說序（1898）；
4. 《飲冰室自由書》傳播文明三利器（1899）；
5.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
6. 《新中國未來記》緒言（1902）；
7. 新小說第一號（刊於《新民叢報》）（1902）；
8. 中國唯一之文學報 新小說（刊於《新民叢報》）（1902）；
9. 告小說家（1915）⁹

在《變法通議》論幼學 中論「說部書」的文字中，梁啟超在探究何以中國落後於西方諸國後，提出他對教育改革的建議，其中的一個要項即是提倡小說。他首先提出小說受一般平民鍾愛之原因，是因為小說的語言明白易解。但是由於士大夫一向鄙視小說，以至於以小說來教化百姓的最佳途徑，淪落到「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戲恣肆以出之，誨盜誨淫，不出二者。」梁氏因而呼籲自俗儒陋士手中收回此一最佳工具，並用以教育平民，裨益國家社會。

今宜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闡聖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醜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癩、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為補益，豈有量哉。¹⁰

本段引文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任公指出為教育大眾，小說應採俚語。其二，任公提出小說功能有三：1. 教導讀者；2. 提供知識；3. 揭發惡習時弊。小說之教化功能是傳統小說一貫的功能，毋庸再談。提供知識（時事）在此和社會政治大環境息息相關，可以說是擴大了小說所能關切的範疇。至於惡習時弊的揭露，恰是數年後所謂「譴責小說」作者所致力的方向。但

9 《變法通議 論幼學》見《飲冰室文集》第1冊1卷，頁44-60；《蒙學報、演義報合敘》見《飲冰室文集》第2冊2卷，頁56；《譯印政治小說序》、《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告小說家》均收於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以下簡稱《研究卷》）；《飲冰室自由書》收於《飲冰室專集》第3冊；《新中國未來記》緒言 見《晚清文學叢鈔：小說卷》第1冊上卷；《新小說第一號》及《中國唯一之文學報 新小說》刊於《新民叢報》（1902）。

10 《飲冰室文集》第1冊1卷，頁54。

是，以上種種的小說功能歸根究底總要落實到為維新事業服務。任公不僅要讀者明瞭社會中非人道的陋習，更要大家體會到中國目前的政治困境與民族危機。不過小說如何獲致以上的功效，梁氏在此並未縷述。

譯印政治小說序 一文於 1898 年初刊於橫濱出版的《清議報》。何謂「政治小說」？任公並未賦與清晰的界說，不過文中仍可略見端倪：「在昔歐洲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¹¹簡言之，政治小說乃是魁儒碩學藉以表達其政治理念、政治關切，並進而傳播新知、教化百姓的媒介。若僅以其中教化功能而言，此處所指之「政治小說」實在與傳統小說無大差異。但是，任公之說有三點值得注意：1.梁氏提出讀者喜歡閱讀容易接受且具吸引力的作品：「凡人之情，莫不憚莊嚴而喜諧謔，故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靡靡而忘倦焉。此實有生之大例，雖聖人無可如何者也。」2.在《變法通議》論幼學 中梁氏只提出小說可以有教化、播知、揭露等功用，但未觸及小說之作用力及其對讀者的影響力。在此，他提及了經驗、思想、及政治議論可以影響讀者：「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 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也就是說他逐步地走向小說閱讀的技巧層面和心理過程的探討。雖然我們在此還看不到具體的討論，但其發展的脈絡已漸漸成形。3.任公至此正式把政治思想言論帶入中國小說的領域中。以小說來談論、傳播政治思想在 1896 年已略觸及，但在此有所發揮，並成為稍後「小說界革命」的一大重點。因此，以往被視作「不入流」、「小道」、「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的小說，現在丕然一變，「殆可增《七略》而為八，蔚四部而為五者也。」而他引康南海「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¹²一段，更是把小說與經史相提並論了。

任公在 1899 年於所辦的《清議報》上刊出一篇 傳播文明三利器 評論短文。任公首先介紹了日本作家犬養毅的觀點，略謂學校、報紙及演說三者為普及文明之途徑。在此三項之外，任公加上「小說」一項。在此，梁氏並未討論小說之本質或功用，而強調小說在協助日本大眾熟悉自由、民主等

11 阿英編，《研究卷》，頁 14。

12 同上註。

觀念上所發揮的功用。在文中，任公臚列了一些歐洲政治小說的日譯本，諸如織田純一郎的《花柳春話》，以及其他受歐洲政治小說影響而著作的諸如柴四郎、矢野龍溪、末廣鐵腸的政治小說。任公並謂：「著書之人，皆一時之大政論家，寄託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固不得專以小說目之。」¹³ 梁氏提倡「政治小說」之緣由在此處清晰浮現出來：小說和學校、報紙及演說，都是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工具。換言之，小說背後的思想與意圖遠比小說此一藝術媒介重要；其「文學救國論」的功利思想在此表露無遺。¹⁴ 而他日後撰寫《新中國未來記》之動機亦可在此略見端倪。

總之，把梁氏截至此際有關小說的文字略作分梳，我們大致可以說：小說對任公而言，不只是獨立自主的美學本體，而是用來表達作者思想，進而影響其讀者，使他們理解社會國家之現況與需求，並進而改進之的一種工具。

但是到了 1902 年，梁啟超對於小說有更深入的理解，這可由 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及《新民叢報》中的 紹介新刊 新小說第一號 兩文中得悉。在這篇簡介即將出刊的《新小說》的短文中，有幾個要點。其一，廣續 譯印政治小說序 的思路，梁啟超重覆「新小說」有別於傳統「誨盜誨淫」的舊小說：「蓋今日提倡小說之目的，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知識，非前此誨盜誨淫諸作可比，必須具一副熱腸，一副淨眼，然後其言有裨於用。」其二，任公再度強調「小說之作，以感人為主。若用著書演說窠臼，則雖有精理名言，使人厭厭欲睡，曾何足貴。」¹⁵ 小說訴諸人類情感的特性，再度受到肯定與重視。其三，任公深入討論中國小說撰寫的技巧暨技術問題上的五難。

名為小說，實則當以藏山之文，經世之筆行之，其難一也。小說之作，以感人為主。若用著書演說窠臼，則雖有精理名言，使人厭厭欲睡，曾何足貴？故新小說之意境，與舊小說之體裁，往往不能相容，其難二也。一部小說數十回，其全體結構，首尾相應，煞費苦心，故前此作者，往往幾經易稿，始得一稱意之作。今依報章體例，月出一回，無從顛倒損益，艱於出色，其難三也。尋常小說一部中，最為精采

13 《飲冰室自由書》，頁 41。

14 夏曉虹也認為任公早年的理念是所謂的「文學救國」，到了晚年則是「情感中心」。參看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頁 13-39。

15 紹介新刊——新小說第一號，《新民叢報》，20（1902），頁 99。

者，亦不過十數回，其餘雖稍間以懈筆，讀者亦無暇苛責。此編既按月續出，雖一回不能苟簡，稍有弱點，全書皆為減色，其難四也。尋常小說，篇首數回，每用淡筆晦筆，為下文作勢。此編若用此例，則令讀者徬徨於五里霧中，毫無趣味，故不得不於發端處，刻意求工，其難五也。此五難非親歷其中甘苦者，殆難共喻。¹⁶

大體而言，我們必須承認任公對於中國的敘事傳統有相當的體會和掌握。他明瞭小說必須訴諸讀者的情感、想像及理性；他也明白小說要達到這種訴求，必須借重一些技術層面上的技巧，諸如製造高潮、懸疑、修辭手法等。他也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傳統章回小說與當代新興的連載小說之分野。但是這些技巧手法之最終目的仍在以與《水滸》、《紅樓》不相上下的「風格筆調」「開導中國文明進步」，「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知識。」也就是說，任公強調新小說應以《水滸》《紅樓》的普遍適眾的風格筆調及技巧手法，來達到「欲維新我國，必先維新我民」的標的。正因為小說有此特性，所以在諸文類中，足可當「文學之最上乘」而不愧。

一個月後，任公最重要的論小說文章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在《新小說》雜誌刊載。在此文中，梁氏提出了他對小說更嚴肅、更詳盡具體，同時也是較具文學觀點的看法。任公首先以其一貫的誇張修辭語氣，宣稱小說可以用來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等。但是除了告訴讀者小說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之外，他在本文中同時以一種文學及心理學的角度，來探究小說「如何」可以達到這些目標。在此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任公雖然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小說，可是他的討論仍然還是落實在以小說作為工具的實用論架構中，這是我們應該要留意的。

首先，如果小說可以用來興群治，那麼任公就得解釋小說如何達到此功用，也得討論何以人們喜歡閱讀小說。一般的看法認為是：「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任公認為事實並非如此。以士人階級而言，他們能閱讀典籍，但也往往是小說的嗜好者，語言之深淺顯然不是小說吸引他們的必要條件。至於小說帶給讀者「賞心樂事」一說，任公則認為小說中往往呈現的是「可驚、可愕、可悲、可感」等各種複雜的情感，並非只侷限在愉悅一端。然則，如何解釋小說之廣受歡迎呢？任公所提出的看法是前所未有的，值得我們注意。

16 同上註，頁99-100。

為了解釋小說之力，任公提出了他對小說的第一個重要論點：「小說者，常導人遊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一看法雖然只有短短一句話，但是對我們研究任公的小說論點卻有關聯。稍後在同篇文章中任公稱呼此類小說為「理想派小說」，其所指涉的好像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烏托邦小說」。我們知道梁氏於西方的「烏托邦小說」有某種程度的了解，至少他對於美國貝勒米氏（Edward Bellamy）的《百年一覺》（*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以及日本末腸鐵廣氏的《雪中梅》是相當熟悉的，而且梁氏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亦是屬於所謂的「理想派政治小說」。¹⁷ 雖然如此，由文章的上下文看來，任公在此所指的毋寧較為接近我們今天心理學上常說的「轉移」（transference or displacement）或是美學上的「神入」、「悟入」或「移情作用」（empathy）¹⁸ 也就是說，小說可以引導讀者脫離其生存的世界而進入另一環境，在那兒他可以探索不同的景物及人物，進而忘記其原本世俗世界的不堪。這樣的小說觀已然觸及到當前小說研究者所關切

17 夏志清曾指出 Bellamy 的《百年一覺》很可能啟發梁氏《新中國未來記》的撰寫，因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 1884 年將貝氏的小說翻譯成中文，而任公在 1895-96 期間曾擔任李提摩太的秘書。此外，我們亦知任公在《西學書目表》（1896）中寫道：「本書（《百年一覺》）亦是西方說部，論及百年後情事」；譚嗣同在《仁學》中將《百年一覺》與《禮運》大同篇的大同思想相比較；康有為則在萬木草堂演說中說：「《百年一覺》，美國作家所作，乃是烏托邦小說。」維新派人士受李提摩太影響應是無可置疑的。有關任公與李提摩太之交往，可參看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64），頁 35-36 及 Ch'en Ch'i-yun, "Liang Ch'i-ch'ao's Missionary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the Reformers," *Papers on China* 16 (1962): 66-125.

18 在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中，「轉移」主要指的是在心理分析的過程中，病患通常有把他作分析的醫生視作是其幼年時期或過去生命中的重要人物的替代者，進而把他情感及反應投射至該醫生身上。參看 Sigmund Freud, *The Dynamics of Transference*,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12, ed. and trans. James Strache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8). 不過，這兒的「轉移」應該比較接近另一佛氏亦討論到的「思想轉移」（thought transference）觀念：一個人的心理過程、想法、興奮的狀態、意志均可無須藉由一般的溝通方式，而在時空中轉移至另一人，參見 Freud,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ed. &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9), Chap. 2. 在文學上，所謂的「轉移」則是在「一個文本的分析過程中，分析者很錯綜複雜地與他或她分析的物品（文本）混揉成一體，以至無法分辨『文本中之意』與詮釋者在分析過程中所投射進去之意。」參看 Jeremy Hawthorn, *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2), pp. 262-3.

的課題，尤其是「通俗小說」研究的重點。¹⁹ 不過我們得馬上指出，許多通俗小說，尤其是現代的通俗小說中極為突顯的「逃避現實」心態，在任公的思想架構中是不重要的，他所關切的仍然是小說如何將讀者引入作品之中，進而提升其德性情操的正面功用。無可置疑地，任公對於小說複雜本質的認識，勢必不可能像我們一般的周全與深入，但不可否認地任公已顯現其對小說本質的敏銳觀察。

任公解釋小說之力的第二要點亦值得我們留意：人們常常習於其所居住之環境以至於感情逐漸遲鈍，因此無法敏銳地體會或表達其情感及感受。這是為什麼小說很容易就攫取讀者的注意力。這個觀點本身並無新奇之處，比較特別之處在於任公使用了「寫實派小說」來解釋此一文學現象，進而開啟了晚清小說分類的風氣。²⁰ 不過，此一名詞很容易和我們今天常用的「寫實小說」混淆。²¹ 我們到目前尚無資料可以顯示梁啟超此一名詞是否是借用自

19 廣義的說，中國傳統小說均可以視作是通俗小說，縱然在藝術性上最為中西學者所異口同聲稱譽的《紅樓夢》，亦為雅俗所共賞。對於「通俗小說」中讀者的「逃避」、「移轉」心理之研究可參看 Janice A. Radway,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尤其是第 3 章：“The Act of Reading the Romance: Escape and Instruction”。有關通俗文學與菁英文學之區分可以參見 Herbert J. Gans, *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ast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p. 9-15. 及鄭明嫻, 《通俗文學》(臺北: 揚智, 1993), 頁 41-77。不過筆者對通俗文學與菁英文學之分野, 和鄭明嫻的看法有很大的出入。鄭氏以「準實用正文 / 虛構正文」、「直指式語言 / 文學語言」、「表面結構 / 深層結構」、「寫實 / 象徵」、「單義 / 歧義」來區分這兩種文化, 但是中國的《三國志演義》、《西遊記》到底是「通俗」作品還是菁英作品? 這中間的分際恐怕還值得我們深思。在西洋文學中, 十八、九世紀的通俗小說如 *Robinson Crusoe*, *Tom Jones*, *Clarissa*, 以及 Dickens 的小說, 現在都是文學史上重要的「經典作品」; 當代英國小說家 John Fowles 的作品既是學院派學者鑽研的「嚴肅」對象, 同時也是市場暢銷書的寵兒。如果以鄭氏的標準來衡量, 顯然無法對此一中西文學共有的文學現象有令人滿意的解釋。

20 夏志清指出梁啟超此一論文「為晚清小說標示分類之始」。各種不同的小說分類包括了「歷史小說」、「政治小說」、「哲理小說」等等。參看 C. T. Hsia, “Yen Fu and Liang Ch'i-ch'ao as Advocates of New Fiction,” in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 ed. Adele Ricket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43.

21 「寫實主義」是一個很複雜, 而且眾說紛紜的文學名詞。可參看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17.

日本批評家坪內逍遙《小說神髓》(1885)中的「寫實小說」一詞，²²但是，任公在文章中所描繪的似乎只是小說作者有特出的能力見人所未見、描繪一般人所不能描繪之事：

人之恆情，於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²³

所以，任公的「寫實派小說」事實上是用來描述小說本質中的某一層面，或者是在突顯出大部分小說讀者的「習以為常感」的態度 (taken-for-grantedness)，²⁴而不必一定如夏志清所提示的，和任何文學學派、運動、或信念相關連。²⁵總之，任公在此用了兩個今日習見的名詞「理想派(烏托邦)小說」及「寫實派小說」，不過都沒有我們今天所意味的複雜意蘊。

除了讀者本身的主觀心態和環境可以讓他們樂於接受小說的新奇觀點及世界外，小說本身到底有何「力量」來攫取讀者的注意力？梁啟超提出了幾個可以用來吸引讀者注意力及參與感的小說要素，那就是所謂的「四種力」：熏、浸、刺、提。「熏」字面義指的是煙或香的釋出，進而縈繞附著

22 夏志清在“Yen Fu and Liang Ch'i-ch'ao”一文註22中指出，坪內逍遙的美學信念是一種純藝術上的追求，這和梁啟超把小說視作是為政治服務之工具，因而重其道德教誨意味的看法是很不相同的。不過，梁氏借用坪內氏之術語而不襲用其原意的可能性，在充溢「豪傑譯」的晚清時代是稀鬆平常的。我們更可從中看出任公在借用外來觀念文字時，往往是依其實際需要而作取捨改變。

23 阿英編，《研究卷》，頁15。

24 Mary F. Rogers 在 *Novels, Novelists, and Readers: Toward a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53 中所謂的「習以為常感」指的是用來處世、待人接物、解讀事物的一種文化上的語言及詮釋策略，一旦此一「習以為常感」因新的事物或想法的出現（如在閱讀小說時現實世界的假象遭受揭穿）而瓦解崩潰時，或是一個嶄新世界的形成，都會在讀者心中激發一種驚歎感 (a sense of awe)。另請參見 Mary F. Rogers, “Taken-for-grantedness,”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A Research Annual*, 2 (1981): 133-151.

25 夏志清認為「梁啟超可以確定是中國第一位使用『寫實派小說』者，而此一寫實派終將主宰爾後，甚至至今天，中國小說之發展。」見 Hsia, “Yen Fu and Liang Ch'i-ch'ao,” p. 251。不錯，梁氏確實是中國第一位提出此一術語者，但如上所言，任公的「寫實派小說」和五四時期由西方引進的「寫實主義小說」是有很大區別的，而後者才是主宰日後中國小說發展的主流。

在某物上。用在小說的討論上即是小說能吸引讀者，使其融入敘事行文中，並影響讀者觀感及判斷的力量。小說所具有的此種吸引人的力量早在綠天館主人的《古今小說序》中一覽無遺：

試令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²⁶

不過任公則是以佛教術語「熏」來描繪此一力量：

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為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為其所染，《楞伽經》所謂迷智為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為之迷漾，而腦筋為之搖颺，而神經為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剎那剎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臺而據之，成為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遍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為因緣也。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眾生者也。²⁷

任公「熏」的觀念來自佛教唯識宗（Yogācāra），和「種子」、「熏習」（vāsanā）等觀念有相當密切關係。根據玄奘《成唯識論》：

初能變識，大小乘教，名阿賴耶。此識具有能藏所藏執藏義故，謂與雜染互為緣故，有情執為自內我故。此是能引諸界趣生善不善業異熟果故，說名異熟。

此能執持諸法種子令不失故，名一切種。²⁸

我們可以看得出任公對於「種子」的說法，基本上是和玄奘無太大區別的，但是當任公述及「熏」的觀念時，兩者便有顯著的差異。在玄奘的《成唯識論》中：

如是能熏與所熏識，俱生俱滅，熏習義成。令所熏中種子生長，如熏苜蓿，故名熏習。能熏識等，從種生時，即能為因，復熏成種。三法展轉，因果同時。如炷生焰，焰生燻炷。亦如蘆束，更互相依。因果俱時，理不傾動。²⁹

在玄奘看法中，在阿賴耶中有諸法種子，有些是原本就有：「皆本性有，不從熏生，由熏習力，俱可增長。」有些則是受熏習而成：「種子皆熏故生。所熏能熏，俱無始有故，諸種子無始成就。種子既是習氣異名，習氣必由熏

26 見黃霖、韓同文選注，《中國歷代小說論注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224。

27 阿英編，《研究卷》，頁16。

28 參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香港：三聯書店，1992），下冊，頁175。

29 同上註，頁176。

習而有，如麻香氣，華熏故生。」種子又可分有漏無漏，有漏種子即世間諸法之因，無漏種子，即出世間諸法之因。

但是根據日本佛教學者鈴木大拙，所謂的「熏習」(vāsanā)，可以指「藏」、「住」、「熏(香)」，而且通常用來指的是「一種熏染的力量，在其作用發揮之後，往往將其本質永遠地遺留在該物(或人)之上。」鈴木將此種力量比擬作現代心理學上廣義的「記憶」。不過，對鈴木而言，「當熏習創造出一個外在的世界，使得我們將其視為最終之真實時，它在道德上是邪惡的，在邏輯上則是錯誤的。」³⁰

對玄奘而言，因為種子可以是漏或不漏，熏習的力量也因此可以是善或惡的；然而對鈴木大拙而言，此一熏習的最後效果往往是邪惡或是錯誤的。但是梁啟超在詮釋種子時，並未賦予負面的意涵。他甚至更進一步認為熏習之力是好的、有益的，如此一來，他可以更加強調小說感染人之力的重要，以及強調小說有被稱為「文學的最上乘」的條件。我們也應該指出，在玄奘的《成唯識論》及任公文章中，種子均是內在本有的，而且是整個世界運行操作的因果之基本力量。

「浸」在本質上是和「熏」分不開的，任公認為前者以空間言，而後者係以時間言，但兩者都是形容將讀者融入敘事文中，進而讓他受到各種情感及思緒的涵泳感染。事實上我們可以將這兩種力量視作是形容同一現象的兩個不同的比喻，因為兩者都是在描繪一種浸入影響讀者的過程；就像水浸潤海綿一般，時間愈久，浸潤幅度愈廣，則影響也愈大。在這兒，我們也看到任公實用理論的強烈傾向：他關懷的並不是作者在作品中所要表達的思想內涵(這是無可置疑的假設：種子是好的、有益的，如我們上頭所示)，而是這些內涵如何傳達給讀者，進而產生正面的過程及效果。

任公的第三種力是所謂的「刺」，一種「刺戳」、「刺激」的力量。和「熏」、「浸」兩種遲緩漸進之力比較起來，「刺」的力量可以瞬時之間把讀者的情感推揚至極其強烈的程度，而且往往是超乎理性的控制。梁氏所舉的例子是當我們讀到《紅樓夢》中黛玉死瀟湘館、晴雯出大觀園、林沖飛雲蒲厄時，讀者倏然起異感，或淚流、或髮指，此皆「刺」之為力也。任公在此

30 D. T. Suzuki, *Studies in the Lankavatara Sutra*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30), pp. 178-179.

處所強調的重點是讀者本人情感的突然被激揚的現象。此一情感被激揚的強度則視讀者個人感性的深厚而定：如果他在理性上極為迅捷、在感性上極為敏銳，則對於事件的反應將會更強烈，更迅疾。

嚴格說來，所謂「刺」，不盡如梁啟超所言，有如「禪宗之一棒一喝」完全由外在之刺激力量而來。事實上，我們閱讀文學作品時所產生的反應，遠比此複雜多了。以現代美學觀念來看，「刺」之力之所以能激揚讀者強烈情感，也許更歸屬於作者如何在作品中經營構築一個情境或氛圍，使讀者融入參與其中，進而激發洋溢其強烈之情感反應，終於達到一種情感的高潮，而非僅僅是因外來之助力才能產生「刺」的反應。

梁氏小說觀中的第四種力是「提」。相對於「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也就是說，任公認為所謂「提」者，即因「熏」、「浸」、「刺」三者之由外作用，灌輸進入讀者，經過內省作用後所產生的反應。這種內在的啟示，對任公而言，是人類本性的最高理想和德性，也就是一種自覺的，內在的自我啟悟，類似禪宗的「頓悟」。讀者如何才能到達此一心境？任公的答案很簡單：「入於書中，而為其書之主人翁。」他舉了幾個例子：讀者通常將自己比擬為賈寶玉、李逵、魯智深；他甚至宣稱當讀者閱讀孔子、釋迦牟尼、華盛頓時，他亦會化身為孔子、釋迦牟尼、華盛頓。藉由如此化身為故事的主人翁，任公認為讀者便可自我提升，不管是在道德上、倫理上、或是在其他方面，到達與這些人物一樣的境界：

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於彼界，所謂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盛頓，則讀者將化身為華盛頓，主人翁而拿破崙，則讀者將化身為拿破崙，主人翁而釋迦、孔子，則讀者將化身為釋迦、孔子，有斷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門，豈有過此？³¹

任公在此想要闡揚的是：道德的提升是小說，以至於所有文學作品的最高理想。為要達到此一境界，「神入」、「悟入」或「移情作用」(empathy)的過程是必要的（「化身」是任公所用的詞）。首先，讀者很自然地被敘事文字所吸引，然後他將心比心、設身處地，一時間與書中主人翁所思、所感、

31 阿英編，《研究卷》，頁17。

所為均一致。經由此一途徑，讀者在閱讀作品後，受到了其感染影響，而在現實生活中道德上更為精進。毋庸置疑，任公在此是在發抒其理想的期盼，因而把極其複雜的現象簡單化了。

在我們的美感接受經驗及心理過程中，與書中主人翁認同的現象是極其複雜的。一般認為在閱讀過程中，讀者總是會和書中人物有認同的情形，這樣的看法是太過化約我們的認同經驗。心理分析批評家賀嵐（Norman Holland）便不得不承認認同過程是個極其複雜的現象，縱使是心理學家也仍然所知有限。³² 賀嵐提出：「文學作品中的人物，追根究底，還是存在於設計虛構的一種日常現實中。」³³ 然則，我們如何可以把一個不真實、虛構的人物，當作是真實的人物來討論呢？更甯提與這樣一個不存在的人物認同了。經由心理分析的角度，賀嵐告訴我們「所謂的與人物認同，事實上是外在投射與內在投射的複雜混合體，由人物中萃取某些內心驅力（drives）及心理防衛辯護機制（defenses），然後把我們真正的情感置於此一人物之上。」³⁴ 我們不必一定要全然接受心理分析理論的觀點，或是諸如「內心驅力」、「辯護機制」等名詞，但是賀嵐在此處描繪了一個由心理分析角度來看待認同過程的梗概。另外，雷瑟（Simon O. Lesser）在其著作中引了一個非常複雜的臨床個案，亦可幫助我們更進一步了解，在與文學作品中的人物認同的過程中，可能展現的多樣性及複雜性：

Edith Baxbaum 對於一個十二歲、病態的偵探小說迷的分析顯示出，這個小孩不僅如我們所預期地和故事中神勇無敵的主人翁認同而已，同時也和故事中被冷漠描寫的壞蛋認同，甚至在其恐怖、痛苦、或死亡之時與之認同。這小孩從故事裏每一個人物的角色，獲得了全然的滿足，不管是表面上的或是暗地裏的。除了故事本身所引發的憂慮外，和偵探認同的心態，讓他在面對真實生活中的恐懼情境時，心理更有安全保障，更可以抗拒其內心的各種衝動。和壞蛋的認同則是可以滿足他壓抑下來的，對他叔父、母親和其他人的強烈敵對情感；而和（故事中）被欺凌者的認同，則是更深埋於內心的壓抑期盼，希望被其叔父所蹂躪，成為性愛虐待中的被動的對象。³⁵

32 Norman Holland, *The Dynamics of Literary Response* (New York: W. W. Norton, 1968; 1975), p. 262.

33 同上註，頁 266。

34 同註 32，頁 278。

35 Simon O. Lesser, *Fiction and the Unconscious*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p. 201-202.

不管是由心理分析或是文學的角度來看，與故事人物認同的問題，在許多方面都遠較梁啟超所呈現的，或是所願意相信的更加複雜細膩。

大體而言，在閱讀時讀者有時會和故事的主角認同，有時則會拒絕之。事實上，在全然地接受和全然拒絕主角之間，存在有類似光譜般的大空間。由另一角度來看，縱使讀者有全盤接受故事人物的情形，其接受過程本身恐怕也不會是任公所說的那麼地截然二分。德國接受美學批評家堯斯（Hans Robert Jauss）曾經就此問題有精闢的解說：「在接受的過程中，觀眾或讀者會經歷一連串不同態度上的變動。驚愕、讚揚、被撼動或感動、同情的眼淚或笑聲、疏離感，這種種的反應構成了在表演或閱讀時，讀者所帶入的美感經驗的主要層面。」³⁶ 為了要探究此種美感經驗的複雜性及細微處，堯斯把認同分為五種不同層次的模式：1. 聯想認同：「一種美學舉動，最清楚地體現於封閉、不實有的遊戲行為中，讀者所扮演的角色上」；2. 讚揚認同：「依完美的模式而定義的美學態度，但是尚遠離進入到悲劇或喜劇的程度」；3. 同情認同：「美學的感染力，可以將自己投射到異於自己的本體（alien self）上，這過程會泯滅讚揚的距離，引發觀眾或讀者的情感，進而引導他與受苦的主角結合一體」；4. 淨化認同：「一種美感態度，使得觀眾可以擺脫其所處世界中的實際利益和糾葛，置身處地地站在受苦的主角的立場，經由悲劇情感或喜劇舒解（comic relief）而獲得解放」；5. 反諷認同：「美學接受的一個層面，預期中的認同已然傳遞予觀眾或讀者，然而隨之被拒絕或嘲諷」。³⁷

不可否認地，堯斯的前提有強烈的亞里斯多德理論的蘊涵，其例子也都是取擷自西洋文學作品，和中國的文化背景不盡相同，但是他的論點告訴我們，在這看起來似乎很簡單的認同現象中，其實蘊含著極為繁複的過程。如果試著用堯斯的模式來看梁啟超四種力中的後二力，我們也許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閱讀小說的經驗，以及梁任公對小說的想法。我們上頭提到任公的「刺」，事實上並非如他所言地是來自外力，而是作者處心積慮地安排構築，

36 Hans Robert Jauss, "Interaction Patterns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Hero," in his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 153.

37 關於這些模式的觀念及功用的詳細說明，請參看 Jauss,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 pp. 164-188.

將讀者一步一步帶到一個情感或情境的高潮，以及讀者對於作者在文本中的種種安排的反應。梁氏的例子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讀者的閱讀過程：「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如果以堯斯的認同模式而言，這應該屬於所謂的「同情認同」，讀者充滿了同情之心，經由此類的認同過程，與不完美的凡人主角認同。³⁸ 當讀者從事於此類互動的過程時，他會滿懷道德關切（比方說，隨時預備起而行動、和主角站立一塊、用可行的方式幫忙他等），而且往往無法保持平靜的心態；他事實上已經把自己「投射」到另一個體上去了，經由作者的引導和此一「受苦的主角結合為一體」。不過，情感之所以被激揚起的原因應該是來自認同的過程中，而非任公所認為的是由外力而來的。

「提」如果也用認同模式來看的話，亦可使我們對作品影響讀者的力量有更深入的理解。對梁啟超而言，「提」是經由和具高尚道德的主人翁認同，最終則和這位道德楷模的人物地位一樣。他的關切當然是讀者道德質性的提升。所以，任公所舉的人物均是諸如孔子、釋迦牟尼、華盛頓等確有其人的道德典範人物，堯斯的模式在此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認同的態度。此一認同的模式應是所謂「讚揚認同」。堯斯解釋道：

讚揚的要求是，美學客體因其自身的完美而能超越一般的期盼，傾向於理想的層面，因而引發一種不會因不再新奇而隨之消失的驚愕感。因此，讚揚並非僅是對於新奇或完美的事物驚歎而已，而且更是一種保持適當距離的舉動（the distancing act），在其中讀者的意識會衡量自身與產生驚愕感的物品之間的距離，進而使得讚揚成為一種美學上的影響力，促使個別讀者承認並且接納這些楷模人物及其行為的模式。³⁹

因為讀者在閱讀時會把自己和主人翁作一衡量，美學距離於焉產生；由於有這樣的距離的存在，讚揚便可以在受制的模仿（unfree imitation）和自由的景從（free emulation）之間有區分。受制的模仿經由精確的觀察，亦步亦趨地模擬所見的模式，受到模仿的人或物無形的箝制，而無法區別它所模擬的對

38 Jauss 在這裡基本上是踵隨 Northrop Frye 在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中對於英雄主角的分類。Frye 根據主角「行動的力量」(power of action) 把他們區分為五個不同的類別：神、傳奇中的半神人物、領袖人物、凡夫俗子，以及反諷角色。至於 Jauss 和 Frye 兩人對於主角人物的不同處，請參看 Jauss, "Interaction Pattern," pp. 154-155.

39 同註 36，頁 168。

象的真正內涵。景從則是一種靈魂的提昇，因為所見之物的美及德而在內心形成一種衷心讚揚，見其賢而思與之齊的心境。⁴⁰

考任公的語意，他所指的「提」應該是一種「靈魂的提昇」，因某物足以引發其讚揚而產生。這是為甚麼他要訴諸超乎凡夫俗子的聖賢——孔子、華盛頓、釋迦牟尼——這些在德性上無懈可擊的道德典範人物，因為這些理想人物的道德、倫理、政治或社會方面的特質，讀者可以去模仿他們，進而提昇自我，到達一個有自覺的、較高的水平。

提昇自我至與典範人物相齊的地位，最終也成為典範人物，事實上與梁啟超希望在小說中提倡的新思想是相契合的。如前所提，一個「新」的中國是任公努力的最終目標。任公相信，為了要達到此一目標，小說 因為其通俗適眾的性質 是最佳的工具。作為傳播維新思想的管道，小說首先就要把維新思想作為其內容，而此恰是傳統小說所最缺乏的內容層面。因此「小說界革命」的最重要提綱，當然就是要強調新內容和新思想。⁴¹何謂「新思想」？當然就是有關改革的思想，或是所謂「新民」的思想。更具體的說，就是：「關切於今日中國時局者」⁴²「發揮自由精神」、「發揚愛國心」⁴³「寓愛國之意」、「描寫現今社會情狀，藉以警醒時流，矯正弊俗」⁴⁴「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吐露其所懷抱之政治思想」、「發明哲學及格致學」、「養成國民尚武精神」、「激勵國民遠遊冒險精神」⁴⁵「言今日社會問題之學理而歸結於政治上關係」⁴⁶等。總而言之，小說的內容應該是有關社會、政治改革的思想。這些思想即筆者所謂的「小說之政治層面」，在傳統小說中可以說是未曾見的，經由任公的提倡才被引入所謂的新小說中，希望經由它們來開啟民智。典範型的人物是供人瞻仰

40 同上註。

41 梁啟超在《夏威夷遊記》所提出的「詩界革命」的提綱也可以拿來印證他在小說上的看法：「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新內容、新語句優先，但是形式還是沿襲舊有。

42 譯印政治小說序，《研究卷》，頁14。

43 新小說第一號要目預告，《新民叢報》，第17號。

44 新小說社徵文啟，《新民叢報》，第18號。

45 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第14號。

46 新小說第二號之內容，《新民叢報》，第20號。

學習的；新思想亦是要讀者學習、熟悉，並加以關切的。兩者都在告訴讀者怎樣的性格和德性是他們應該要具備的、怎樣的人物是他們應該景仰並勉力學習的。對梁啟超而言，小說之所以為「最上乘」，就是因為它有藍圖的功用，可以引導並呈顯上述的種種正面的德性。如果由這個角度來考察，我們必須承認小說已不再是「小道」或是「小說」（相對於「大說」而言），而被賦予了改革社會、拯救國家的嚴肅重大責任。小說已然成為「大道」了。

梁任公的「提」從文學或心理學角度看，漏洞最多，立論最不堅實，但是此一小瑕疵不應該被拿來做指責或是詬病任公之理由，而更應該是一種提醒，告訴我們所有的詮釋、論證都有其歷史、意識形態的限制。

「熏」「浸」「刺」「提」乃是梁啟超在小說裏發現的四種力，可以用來「盧牟一世，亭毒群倫」，但是，如同梁氏所說的，這四種力在某個程度上也是雙面刃：如果「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任公的實用文學觀，視小說為整個社會運作機制系統中的一關節，在此表露無遺。任公認為可惜的是，作為社會公器，小說在傳統社會中卻沒能被妥善利用。相反地，小說往往被用來傳播錯誤扭曲的思想、迷信，甚至支配了一般百姓的意識型態：

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兔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⁴⁷

「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均是由於小說的被濫用所致。對梁啟超而言，小說要為國家社會的衰敗負責任：若小說以正確思想為內容，則其產生的效果必定是好的；若內容不正，則其於傳統中國社會之危害將是不可計數。小說因此是雙面刃：雖然其對社會有不良的負面效果（誨盜誨淫），它亦可以加強忠孝節義等傳統價值觀。在這之上，任公又要求知識分子善用小說的四種力，來參與教育百姓開啟民智的大業。在這方面，梁啟超和儒家的前輩是站在一塊，沒有很大的差別：他們都強調士大夫在道德上較為高超，因此有教化百姓的使命。雖然如此，此一要求菁英階級的知識分子參與提倡通俗文學的意義，應該還是要由大的社會歷史環境來考察，尤其當小說被賦予了維繫「群治」，或是履行李澤厚所謂的

47 阿英編，《研究卷》，頁18。

「救亡圖存」的重任時，這和傳統小說僅強調小說對於個別讀者的道德效果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在這篇論小說及社會國家之關係的重要文章之後，梁啟超繼續考量有關小說的社會功能，並探索把社會政治議題帶入小說中的可能性，這個嘗試具體地表現在《新中國未來記》的寫作：

此編今初成兩三回，一覆讀之，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自顧良自失笑。雖然，既欲發表政見，商榷國計，則其體自不能不與尋常說部稍殊。編中往往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連篇累牘，毫無趣味，知無以饜讀者之望矣。其有不喜政談者乎？則以茲覆瓿焉可也。⁴⁸

有關《新中國未來記》筆者另有文章詳細討論，⁴⁹在此只想指出，許多現代批評家對於任公此一未完的小說，往往認為是失敗的「小說」，⁵⁰但是如果我們從任公試圖把政見、國計、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融入到小說中的觀點來看的話，任公實在是開啟新局的先鋒。這些政治的層面，如筆者在上面所論及的，在傳統的小說中是絕無僅有的。

梁啟超有關小說的最後一篇文章，告小說家發表的時間是1915年，離上一篇文章（1902年）已隔了13年的時間。在這十多年的漫長光陰中，任公對於小說的看法有何改變？我們知道在這些日子裡，中國經歷了許多巨大的變動。比方說，科舉制度廢止於1905年；滿清帝國在1911年被推翻，由中華民國所取代。但是在這段期間梁啟超沒有任何討論小說的文章產生。任公這篇文章仍然承繼一貫的看法，顯現出極為濃厚的社會政治意味。在文章伊始，梁氏還是重複早先文章中的主題：小說地位低落但是卻能廣受百姓歡迎的矛盾。他又進一步討論背後的原因，思路和往昔並無兩樣：蓋小說有熏習之力的緣故。早期小說誨盜誨淫、傳播陳腐思想的情形，因「憂世之士，睹其險狀，乃思執柯伐柯為補救之計，於是提倡小說之譯著以躋諸文學

48 《新中國未來記》緒言。

49 參見陳俊啟，梁啟超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一個文學類型的考察，《第六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壢：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所，2000），頁307-339。

50 比方說，阿英就認為《新中國》只是「政論」而已。見《晚清小說史》，頁100。夏志清則認為梁氏到了第四回時靈感已枯竭，無以為繼了。見《新小說的提倡者：嚴復與梁啟超》，收於林明德編，《晚清小說研究》，頁80。林明德也認為「作為小說，它也許禁不住藝術觀點的檢驗」，見《論晚清的立憲小說》，亦收於《晚清小說研究》，頁133。

之林」，一時之間小說甚至凌駕古文詩歌等其他文類，成為文學之最上乘。「故今日小說之勢力，視十年前增加倍蓰什百」。然而任公及其他維新人士十多年前所提倡，以開啟民智、救亡圖存為職志的「新小說」，卻日漸為腐化人心的通俗小說，諸如「鴛鴦蝴蝶派」小說所取代。⁵¹任公自言：「試一流覽書肆，其出版物，除教科書外，什九皆小說也。手報紙而讀之，除蕪雜猥瑣之記事外，皆小說及遊戲文也。」在任公眼中，現在充斥書肆及報紙的小說，甚至比十多年前他所抨擊的誨盜誨淫的小說更為低下不堪：

其什九則誨盜與誨淫而已，或則尖酸輕薄毫無取義之遊戲文也，於以煽誘學國青年弟子，使其桀黠者濡染於險詭鉤距作奸犯科，而摹擬某種偵探小說之一節目。其柔靡者浸淫於目成魂與踰牆鑽穴，而自比於某種艷情小說之主人者。於是其思想習於污賤齷齪，其行誼習於邪曲放蕩，其言論習於詭隨尖刻。近十年來，社會風習，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謂新小說者階之厲？⁵²

最後，任公以極為情緒的用語，懇請「世之自命小說家者」多造福少造孽，勿「為妖言以迎合社會，直接阨陷全國青年子弟使墮無間地獄，而間接戕害吾國惟使萬劫不復」，否則會墜入地獄，遺禍子孫。

這篇文章，由於其刊載的時刻及其中嚴厲、富挑鬥意味的語氣，值得我們留意。大體而言，梁啟超的小說觀無什麼變動：他還是提及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小說可使善使惡的雙面力量；他也籲請知識分子為改善社會正人心而努力。我們知道在 1915 年時，政治氛圍已然改變，遠不同於 1902 年之際：此時軍閥割據、政府腐敗、人心仍然未開、社會仍然腐敗不振。雖然在此時已沒有必要再提倡用小說來「救亡圖存」，然而新小說的效應卻無法與社會的變遷同遞進，甚且更推波助瀾，使得情況更惡化。這種種因素促使任公再度起而呼籲懇請大家正視此一問題，重新再強調小說的社會政治功能。根據林培瑞 (Perry Link) 的研究，當時最流行的通俗小說大致可以區分為：愛情小說、俠義小說、譴責小說及偵探小說。所有這些在本世紀初流行的小說均可追溯其源流至中國的傳統小說，如《紅樓夢》、《水滸傳》、諷刺小說、

51 任公並未明言他所指責的是哪些小說，但是我們知道「鴛鴦蝴蝶派」和「禮拜六派」小說在 1910 年代極為流行。陳平原在他所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中所收的 1914 年前後的序跋或宣言的作者大部分均和此二派別有干係，比如說：徐枕亞、吳雙熱、徐天嘯、陳梅溪等人。徐枕亞的《玉梨魂》出版於 1912 年；《禮拜六》雜誌初刊於 1913 年。

52 阿英編，《研究卷》，頁 20-21。

公案小說等。⁵³ 這個由「建國到消遣到營利」的趨勢，⁵⁴ 很明顯地忽略了任公十多年來所強調的小說的道德政治意涵。

三、梁啟超小說觀的新評估

在把梁啟超有關小說的文章檢視過後，我們大致上對任公的小說觀有較清晰的理解。因為任公的小說觀和他思想的發展，以及當時的社會政治現實有相當密切的關聯，下面將試圖用一個理論架構，來考察文學事件如何與歷史變遷相互作用。更具體的說，我們將嘗試看梁啟超的思想發展如何受到特定的歷史情狀的衝擊和影響，進而形成艾瑞克（Jonathan Arac）所謂的社會動力（social motion）⁵⁵

艾瑞克認為 19 世紀英美小說大家及歷史家，諸如狄更生（Charles Dickens）、卡萊爾（Thomas Carlyle）、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及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等都胸懷一種社會使命感（commissioned spirit），此一社會使命感乃是一種「想像的使命感，希冀運用知識的力量及其靈視，來揭發、改變他們與讀者所居處的變遷社會中的惡劣環境。」⁵⁶ 不同於馬克思決定論者將文學作品視作是歷史環境的必然產物的看法，也不同於模擬論者視文學作品僅是現實生活的忠實重現的觀點，艾瑞克主張我們應該有更複雜周全的看法，把文學作品和其週遭的大環境（milieu）的關係視作是一種折衝協調（negotiation）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兩者既是促發的力量，同時也是此力量的承受者。換言之，作家不管在精神上或是物質上，都無可避免地受到其所處文化環境的制約和影響，但是，就如同艾瑞克試圖在他書中所闡釋地，作家所共享的想像及信念，往往也能發揮一股巨大，不可測的力量來左右歷史的發展。文本（texts）是大環境（context）的產物，但是大環境也是由各

53 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 9.

54 “From Nation-building to Time-killing to Profit” 是林培瑞書中第四章的標題。小說如何由任公「救亡圖存」的「工具論」逐漸轉到消遣娛樂，可參看林培瑞在此章中的討論。

55 Jonathan Arac, *Commissioned Spirits: The Shaping of Social Motion in Dickens, Carlyle, Melville, and Hawthor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xv.

56 同上註，p. xvii.

種不同的文本所構成，因此也會受到個別文本不同屬性的影響。這樣的關係並非是前定的，而是不停消長變動不居的。此種過程和關係即是艾瑞克所謂的「社會動力」。

事實上梁啟超的小說觀是和他的社會政治關切不可分的。要了解梁啟超的小說觀的真正意義，我們必須把他的思想背景和發展過程列入考量，而這一切又與當時歷史社會環境密不可分。

不過我們要討論及理解梁啟超實用的小說觀之前，有件事還是得切記在心：對梁啟超而言，藝術家的首要關切是他一己瞬間的情感及此一情感的行諸筆端，之後他則必須十二萬分的謹慎小心其可能產生的後果，因為文字的終究目的還是與人溝通。

藝術的權威，是把那霎時間便過去的情感，抓住他令他隨時可以再現；是把藝術家自己「箇性」的情感，打進別人們的「情閥」裡頭，在若干期間內占領了「他心」的位置。因為他有怎麼大的權威，所以藝術家的責任很重，為功為罪，間不容髮。⁵⁷

這種講求文學的功用、影響及實際性，到最後與當時迫切的社會政治情境結合一塊：凡事均應以救亡圖存、傳播新知、教育國民為首要職志。事實上除了我們上頭所討論的文章外，梁氏在 1920 年代的著作亦可支持我們這兒的論點。舉例說，任公的討論陶淵明、傳統韻文中的感情等，都觸及到情感及其表達的問題，但是到最後，此一感情及其表達，終須臣屬在社會責任之下。任公的主要關切仍是歸根到儒家的傳統，從實用的觀點來考量所有的事物。和大部分的儒家學者一樣，雖然對於事物的美學層面極為熟悉，他還是要強調凸顯其社會層次的涵義。

1898 年之前，梁啟超僅有一篇討論小說的文字，而且此篇是從小說的周邊枝節處著手，僅僅是任公《變法通議》中教育改革的一小節目而已。他當時所關切的重心在維新變法事業。思想史學者張灝曾經指出，梁氏的維新改革思想，是以所謂的經世思想為基礎發展出來的。⁵⁸不過，梁啟超的經世思想有來自當時流通的經世思想，也有加入任公自己的想法者：「對梁氏而言，經世的理想並不僅僅是一種政治行動主義的信念，或只是廣義的社會責

57 參見梁啟超，《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感情》，收於《飲冰室專集》，第 5 冊，頁 1-2。

58 對於經世思想在晚清時的影響力及其意涵，參看張灝，〈宋明以來儒家經世思想試論〉，《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84），頁 3-19。

任而已，它同時更具體地意味著政體的改革是實踐經世理想不可或缺的一環。」⁵⁹正是這個對政體改革的信念促使梁啟超從事於《變法通議》的撰寫。科舉及教育改革是《變法通議》中兩個重要的項目，任公論小說的文字則首見於教育改革之中。在政治改革上，任公認為有兩個管道可以採行：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或是由下而上的教育改革。在此時期，任公很明顯地是傾向於前者。⁶⁰但是張灝也指出：「百姓的教育問題一向就是儒家所重視的，這可於『教化』一詞見之」；而「梁氏觀念裏學習的最終目標是經世，經世則必須由人格的發展開始。」⁶¹要講人格的發展，個人的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任公是在儒家「內在世界的政治行動主義」⁶²的理想上撰寫《變法通議》，同時也在儒家的教化理想下來討論小說在教育改革中所占有的地位。這兒我們可以體察到一種極為強烈的儒家道德菁英主義的意味，將教育百姓視作是知識分子必要的責任。梁啟超與其前輩不同之處，則在於晚清時期的政治社會局勢所要求的，已不僅僅是道德上的改革而已，而是規模更為龐大、更全面的政治、經濟、社會倫理以及各個層面的改革了。任公理解到小說以及新的報章體文字可以結合起來，為維新事業盡一份心力。從這個面向來考量的話，我們可以說任公亦是胸懷一種社會使命感（commissioned spirit），「希冀運用知識的力量及其靈視，來揭發、改變他們與讀者所居處的變遷社會中的惡劣環境。」⁶³

任公的下一篇文章，譯印政治小說序 發表於 1898 年，政治情勢和整個環境已經有很顯著的大改變。他現在是居住在日本的政治流亡者。在政治上梁啟超已如龍困淺灘，遠離政治舞臺的聚光燈，不易有大作為了；但是在思想的發展上他倒是如魚得水，能有機會廣為接觸吸收日本的文學及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的西方著作的日譯本。我們上頭提到任公的維新思想有二個管道，即從上的政治改革及從基層開始的傳播新知、開啟民智的教化工作。現

59 Hao Chang (張灝)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73.

60 同上註，頁 77-80。

61 同註 59，頁 80、81。

62 「內在世界的行動主義」(inner-worldly activism) 是張灝教授在授課時所用的詞語，用來形容儒家「內聖」及「外王」兩者之間唇齒相依不可須臾分離的關係。

63 同註 56, Arac, p. xvii.

在，從政治上改革的路已然走不通了，任公更深刻感受到另一管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在《傳播文明三利器》一文中歸納出學校、報紙、演說及小說為普及文明的途徑。⁶⁴ 在任公此時期的著作中，當時日本的學術思想潮流，以及梁氏日益發展遞進的新思想，都有很具體的流露。因此，要明白任公此一時期論小說的文字，我們不能不考量檢視任公在日本流亡時期的思想發展。

在梁啟超流亡日本之前，他的思想中已有一個重要的發展——「群」的觀念。⁶⁵ 此時，任公「所關切地是如何把中國人民組織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凝聚一塊、井然有序的政治體」，⁶⁶ 而此一觀念「是他道德思想中的中心，因為我們可以由他把群定義為道德體系的中心功用上得知」，其原因則是「群」乃是「道德的精髓，可用來強化團體的凝聚力並促進團體的利益。」⁶⁷ 「群」的觀念，猶有進者，應該和「新民」的觀念一起考量，因為這是任公在此時期小說觀中的另一重要觀念。

和「群」的觀念一樣，任公的「新民」思想也是在尋求一個既合適又有效的方法，可以用來因應西方勢力的蠶食鯨吞。歷經「自強運動」和「百日維新」的潰敗，任公終於明白政治上的體制內改革，實在不足以應付擔當救亡圖存的大業。體制內的政治改革縱然不可或缺，可是另一管道的儒家傳統

64 梁啟超所編輯或創立的七個重要報紙雜誌中，有五個是在日本出版的：《清議報》（1898.11-1901.11），《新民叢報》（1902.1-1907.10），《新小說》（1902.10-1905.9），《政論》（1907.10-1908.6），《國風報》（1910.1-1911.6）。參看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頁253-321。另外我們應該留意的是，任公的此處「文明」指的是「現代性」（modernity）或「現代化」（modernization），而不是我們今天所意味的「文明」（civilization）。此點請參看 Philip Huang, *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p. 53-56.

65 根據張灝的精闢研究，梁啟超「群」的觀念不能簡單地視作是傳統思想中「和諧」（organic harmony）及「道德結合體」（moral solidarity）的承繼而已，事實上任公的「群」已受到西方社團組織和政治凝聚結合的觀念的啟發。因此，任公的「群」涵括的意義有：1. 人民的結合一體（integration of people）；2. 社團政治體系的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ty's political system）；3. 新社團所包容的範疇（the new community's scope）。這幾點之下所隱含的則是中國所最關切的政體問題（the overall concern about the polity that China should need）。見 *Liang Ch'i-ch'ao*, pp. 95-96.

66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p. 96. 若欲更深入理解梁啟超的「群」的觀念，請參看同書頁95-100。任公在1896年的《說群序》中首先揭櫫他對「群」的討論，見《飲冰室文集》，第2冊，卷2，頁3-6。

67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p. 151.

教化觀顯然也有不足。流亡日本給予任公一個機會去接觸各式各樣的思想，進而深入思考以儒家為中心的傳統思想的價值。對於加藤弘之（1836-1916）福澤諭吉（1835-1901）中村正直（1832-1891）等思想家的作品的涉獵，讓任公可以由另一參考體系來思索一些他想要解決的問題。⁶⁸ 比方說，加藤弘之的一些看法，就促使梁啟超用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觀點來思考中國的現況，認為中國已然處於危亡存滅的關頭，如果國民不起而奮發圖強，中國在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競爭世界裏將無法生存下去。另外，中村正直所提出的「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凌駕他國之原因，乃在於其道德」的看法，也讓任公試圖把道德和國家的存亡興廢連繫在一塊。⁶⁹ 至於要使中國可以和其他國家競爭所需要的各個國民的「獨立自尊」感，則是福澤諭吉道德準則裏的基本理念，因為「提升吾國人民的道德規範，讓他們不愧為文明國家之一分子」，乃是福澤諭吉的最高理想。⁷⁰ 總而言之，梁啟超把他的「群」的理念和明治三大思想家的思想結合起來，獲致一個結論，就是：要想和世界其他國家相競爭，中國必須培育具有新的德性的國民。這就是任公的「新民」。

這種新的理想人格有它來自傳統的傳承。梁啟超經由日本思想的中介，把中國傳統的儒家德性與西方的公德結合一起。不過在這裡，由於討論的主題與篇幅的限制，我們無法深入的探討理想的新民所應具有的各種德性。⁷¹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理想人格的建立和國家存亡的命運被連繫在一塊，以及任公的思欲經由小說來促使達成此一目標。這正是任公為何要提倡政治小說

68 任公由此三位日本思想家所獲得的啟發，請參看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p. 144, 以及 Philip Huang, "Liang Ch'i-ch'ao: The Idea of the New Citizen and the Influence of Meiji Japan," in *Tradition and Permanenc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Dr. Hsiao Kung-ch'uan*, ed. David Buxbaum & Frederick W. Mote (Hong Kong: Cathay Press, Ltd., 1972), pp. 87-93.

69 任公此處所強調的西方德性，並非中國「儒家傳統所肯定的個人修身的觀念，以及私人與私人交往的德性，如孝悌與朋友之義等」，而是中國所欠缺的「公德」，諸如「結合權利與義務思想而有的自由、自治、合群觀念與國家思想，以及進取冒險和尚武精神」等德性。見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4），頁 44 及 Philip Huang, *Liang Ch'i-ch'ao*, p. 91.

70 Philip Huang, *Liang Ch'i-ch'ao*, p. 92.

71 請有興趣者參看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pp. 149-219. 亦可參看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頁 41-61。

的理由；這也是 1898 及 1902 年發表的論小說的文章背後的主要思想。

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於小說。於是彼中綴學之子，覺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僧，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⁷²

如果我們用「教化」、「群」及「新民」的觀念來看待檢視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要了解任公的小說觀，絕對不可能不去了解他思想的發展以及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當然，如果我們從文學的角度來考量的話，梁啟超似乎只是把文學當作是一種提倡政治思想及理想的工具而已。雖然如此，我們還是不應該忘記，如上所論地，儘管任公對於中國小說的傳統有相當深邃的認識，他的主要關切從來就是非文學的：文學，儘管有其內在的美學藝術價值，仍然需要參預到救亡圖存的救國大業之中。任公在此一文章中亦明白呈現所謂的「社會動力」是怎樣的作用。在面臨中國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機，我們可以說任公試圖運用包括文學在內的各種方法來突顯境況的危急，並試圖為未來的理想國民及國家畫出一個藍圖來。這也是王德威在他著作中所謂的「小說中國」，小說可以「記載中國現代化歷程」，「國家的建立與成長，少不了鮮血兵戎或常態的政治律動。但談到國魂的召喚、國體的凝聚、國格的塑造，乃至國史的編纂，我們不能不說敘述之必要，想像之必要，小說（虛構！）之必要。」⁷³ 王德威以一種後設的立場，指出小說除了有反映現實的功能外，其虛構性亦足以構築出一個想像的中國來。但是對梁啟超而言，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課題，而是一種信念、一種使命感。

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此一使命則是以更明顯、甚至誇張的語氣在首段中表達了出來。任公首先解釋小說與道德的更新是不可分的，同時小說具有「不可思議之力」來改變惡劣的環境。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⁷⁴

72 阿英編，《研究卷》，頁 14。

73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1993），頁 3-4。

74 阿英編，《研究卷》，頁 14。

此篇文章特出之處當然是任公提出一個詮釋的架構，試圖來解釋小說之所以能吸引人，影響讀者的地方。但是我們也不可見樹不見林，忽略了任公整體的視界以及這篇文章的最終目標，乃是本諸社會使命感，來教育百姓，達到新民救國，最後建設一個新中國的職志。1902年的新小說第一號也應該由此角度來衡量。

1915年告小說家發表時，整個大環境，以至於梁啟超本人強調的重點，都已經產生變化，不過任公的政治社會傾向大體上仍然存在。1915年時救亡圖存已經不再是切身急迫的課題（或者我們可以說是以另外一種面貌出現，不再是過去的外力入侵瓜分的情況了），但是任公改變國民性來建設現代新中國的理想仍然存在，甚且更強烈急迫了。這麼多年來希冀利用小說的通俗適眾特性來改變國民性的想望似乎是徒勞無功，面對這樣的處境，任公不得不挺身而出，再度譴責未能導入正途的通俗小說中誨盜誨淫的怪行異狀。⁷⁵

四、結 論

中國的傳統小說自來就是極為通俗地流傳在士大夫及一般的百姓之中。其通俗性其實是來自小說此文類本身吸引讀者，訴諸人類情感及理性的能力。晚清時，由於不尋常的政治社會情境，使得一般知識分子對於小說的看法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在一方面，這些知識分子（可以任公為代表）仍然承認小說本身的娛樂及教育功能，一方面又想改變小說的本質，利用此一通俗的文類來為救中國的神聖使命服務。如此高蹈的企圖，與傳統文以載道的觀念結合起來，不可避免地就把小說的方向轉移，發展出夏志清所謂的「感時憂國」的現代小說傳統來了。不可否認地那些不必擔負救亡圖存的重責，既通俗又富娛樂性，同時又為知識分子所鄙夷的「誨盜誨淫」的小說，仍然存在而且勢力龐大。雖然如此，我們卻不得不承認中國小說中的一股反映社會現實以及要求社會行動的主流已然產生，而梁啟超即是為此一潮流奠下基礎的領頭人物。

梁啟超的言論在晚清時發揮了既深且廣的影響力，他的小說觀不管是對當時的小說創作者、或是評論者，以至於後來者如魯迅、胡適、郭沫若等都

75 這兒我們也可以將魯迅有關改革「國民性」的觀點連繫在一塊思考。

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儘管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引用一些現代的觀點來批判評估梁啟超的小說觀，但是筆者同時也嘗試用思想史的觀點，將任公的小說觀放置到他思想發展以及社會政治的大環境中來省察，希望能看出文本 (texts) 及大環境 (contexts) 之間的相互作用的微妙複雜關係，進而將梁啟超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地位略作釐清。最後我們大致可以說，梁啟超的社會政治取向的小說觀，承繼了中國的載道傳統，並揉雜了扶桑、歐西的政治小說觀點，將政治層面帶入中國小說中，既「普及」也「提高」了小說的地位，對當代及後來的作家、評論家有深遠的影響，並左右了後來中國小說的發展，建立了中國小說的一個傳統。從梁啟超的小說觀，我們可以追溯出中國小說在晚清時期如何化合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如何與其他的歷史、社會、思想言談 (discourses) 相互作用構成了整個晚清的大面貌，並發展出新的小說傳統。雖然由我們今天較為複雜的文學研究立場來看，梁啟超的一些觀點可能不盡令人滿意，但是梁啟超在中國小說從傳統邁進現代的發展過程中，其貢獻是不容置疑的。

A Re-evaluation of Liang Qichao's View on Fiction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Chun-chi Chen*

Abstract

Liang Qichao (1873-1929)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ellectual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His view on fiction can essentially be seen as inheriting that of the moralistic tradition; however, Liang brings into fiction the discourse of politics, and therefore not only greatly changes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fiction but also enlarges the scope of Chinese fiction. In addition, Liang's discussions of fiction also touch upon such important issues as the nature, function, and techniques of fic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haracterize Liang's views on fiction and how they are related to his developing thought as well as the prevalent discourses at his time, so as to form a cultural milieu of "saving China and surviving 救亡圖存." This concern would eventually pave the way for the upcoming "obsession with China" as seen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form a major trend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Keywords: Liang Qichao, fiction, new fiction, Late-Qing literature, 2 kinds of fiction and 4 seminal elements (*erde sili* 二德四力)

* Chun-chi Che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chung.